

看似静穆非静穆，题闲赋闲非写闲

——陶渊明田园诗解读

◎卢惠平[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，广东 茂名 525200]

摘要：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田园诗人，但对其田园诗的解读，历来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笔者认为，陶渊明的田园诗字里行间往往隐含着一股愤激不平之气，是静穆其表，愤激其里。这种特点，是其生活的社会使之然，是其秉性气质使之然。

关键词：田园诗 静穆 题闲 赋闲 隐晦 曲折

陶渊明，一名潜，字元亮，私谥靖节，别号五柳先生，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）人，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、文学家、辞赋家、散文家。后世称他为“百世田园之主，千古隐逸之宗”。

陶诗的最大特色是善于运用朴素平淡的语言，表现日常生活及其感受，不但描写外界景物十分真切，而且把他那真率的性格、内心世界的种种活动和盘托出，非常真实坦白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，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，也赢得了我国历代众多注家、评论家的苦心研讨。在唐代，李白、高适、颜真卿、白居易等极力推崇其人品和气节；孟浩然、王维、韦应物、柳宗元等认真仿效其题材与风格。北宋以后，他的地位愈尊，苏轼认为：“渊明诗，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”，并著有《和陶集》，追和陶诗111首，大有将他置于曹、刘、李、杜之上之势；南宋理学家朱熹、陆九渊也大力赞扬他的诗，不遗余力；元明清三代，注陶、评陶风气大开，注本、评本之多，几与注杜、评杜相埒。真乃是“其人虽已没，千载有余情”！

然而，对陶诗的评价、解读，历来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特别是其田园诗因为以其长期隐居农村的各种生活为题材，往往营造出一种和谐、安详、静穆、优美的意境，因而有些研究者便由此推断陶渊明是“浑身静穆”的“田园诗人”；有的论者很乐于称道渊明胸中的“无一点黏着”。笔者认为，自云“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”的陶渊明生逢乱世、怀才不遇，即使退隐以后，胸中也不可能“无一点黏着”，他内心深处还是不乏焦虑乃至愤激的情绪的，其浓烈程度几乎超过同时代所有的诗人，他的田园诗其实是：看似静穆非静穆，题闲赋闲非写闲。

一、在“静穆”的外衣下，暗含“猛志固常在”的思想意绪

陶渊明留传后世的诗虽只有125首，但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只要细读其诗，就会隐隐觉着字里行间隐含着一股愤激不平之气。如《杂诗》《读山海经》《咏贫士》等组诗向来就被人们认为是“金刚怒目式”的作品。就是一直被评论家认定“静穆”的代表作，如《归园田居》诸篇，其实也并不“静穆”。

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元年，主动辞去了彭泽县令，决意退隐田园，从此不再出仕。次年写了《归园田居》组诗五首，五首诗分别从辞官场、聚亲朋、乐农事、访故旧、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离开官场时的愉快心情，赞美躬耕生活和田园风光。作者将恬淡幽美的园林风光，舒适闲静的生活情趣，“披草共来往”的喜人镜头，“戴月荷锄归”的迷人场面，写得惟妙惟肖，恰如一帧帧绝妙的水墨画，真称得上是够“静穆”的了！然而，只要你细细品味，就会发现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愤激不平之气。如第一首：

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
本诗叙述弃官归田的原因，归田之后的村居生活，重返自然的愉快心情。诗中，诗人将官场和田园相比较，认为官场的生活就如同“羁鸟”“池鱼”一样，扭曲人性，毫无自由快乐可言，而归隐田园则是鸟归山林、鱼归深潭。无论是后檐的榆柳、堂前的桃李，还是暮色中的远村、袅袅升起的炊烟，甚至狗吠、甚至鸡鸣，都让他觉得新鲜亲切，兴味盎然，田园生活，那是真正的人间天堂。结尾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，看似平静温和，但诗人内心深处如春潮漫涨，激动难宁。他将仕途比作“尘网”，把从仕时的“我”喻作“羁鸟”“池鱼”，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“樊笼”，返回“自然”。爱憎之情溢于言表！又如第三首：

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

这是一幅天上溶溶月、地上绰绰影的“夜归图”，表面看来真是“静穆”之极。但作者却在篇末笔锋一转，略露微词：“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”。对归田之意如此珍视，其中就隐含了其对仕宦生活的厌恶、鄙视之情。

再如陶渊明归隐田园十六年后创作的《桃花源诗并序》，诗人在诗中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：“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”，“重孺纵行歌，斑白欢游诣”，人人都“怡然自乐”。这里没有剥削，没有压迫，人人劳动，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，似乎毫无愤激之笔可寻。实则不然，盛赞桃源之美，不正是针砭尘世之丑吗？更何况诗前小序将“秦”“汉”“魏晋”并提，将故事背景放在“晋太元中”，难道这不足启人深思吗？“淳薄既异源”句更是指明了桃花源中的风气“淳朴”，而人世间的人情“淡薄”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直接否定！这也足以证明，归隐后的陶渊明胸中并不是“无一点黏着”。

又如《和郭主薄》：“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列；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。”难道这仅仅是对霜威下盛开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的尽情赞颂？难道这里就没有对“风霜”之流的极大鄙夷与讽刺！可见，即使是看来“静穆”的作品，也是“静穆”其表，愤激其里的。

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。他的《饮酒》二十首其实是以“醉人”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、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；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；或反映仕途的险恶；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；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。东晋元熙二年（420），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，次年杀之自立，建刘宋王朝。《述酒》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，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。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，乱世也看惯了，篡权也看惯了，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。

再如《饮酒·结庐在人境》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二句，历来被评为“静穆”“淡远”，得到很高的称誉。但沈从文却在《“商山四皓”和“悠然见南山”》一文中指出“南山”即指“商山四皓”，商山四皓后有出山辅政之举，故陶渊明目其为圣为贤。“悠然见南山”，悠然闲放的背后，当别有隐情，身在草野而心存帝阙，这才是诗人“资志没地，长怀无已”伴随他一生而无从割舍、难以化解的情结。清代龚自珍也说：“陶潜酷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。莫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《梁甫》一分《骚》”（《己亥杂诗·舟中读陶诗》），把陶渊明看成隐居卧龙冈、口吟《梁甫吟》的诸葛亮，这还不是在待机出山吗？

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几乎篇篇有酒，但题“闲”、赋

“闲”之处也不下二十。如“童冠齐业，闲咏以归”（《时运》），“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”（《归园田居》），“或有数斗酒，闲饮自欢然”（《答庞参军》），“闲居三十载，遂与尘世冥”（《辛丑岁七日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）等。然而，陶渊明题闲、写闲之篇，并非赋闲之作，在闲静幽适的背后，也往往显出作者内心的极不平静。如《九月闲居》，虽曰闲居，一点也不悠闲！“秋菊盈园”，自是幽静闲适；可“持醪靡由”，又是多么扫兴！天高气爽，燕去雁来，如此秋光。怎不怡人？可是作者却唱出大异其趣的诗句：“酒能祛百虑，菊为制颓龄。如何蓬庐士，空视时运倾！”言祛百虑正是心有百虑，要制颓龄正是心忧颓龄。难怪乎作者末了发出这一深沉而又激切的慨叹和呼叫了！

由此可见，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由衷地赞美“躬耕自资”的“悠闲”生活，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依然跳动着“大志济苍生”“猛志固常在”的建功立业、光耀门庭的思绪。还是心追手摹“自谓不甚愧渊明”的苏轼说得真切“观陶彭泽诗，初若散缓不收，反复不已，乃识其奇趣也。”（《书唐氏六家书后》）

二、陶诗曲意表达愤意的原因

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。曾祖父陶侃，是东晋开国元勋，军功显著，官至大司马，都督八州军事，荆、江二州刺史，封长沙郡公。祖父陶茂、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。但到陶渊明时已家道衰微，他九岁丧父，与母妹三人度日。孤儿寡母，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。孟嘉是当代名士，“行不苟合，年无夸矜，未尝有喜愠之容。好酣酒，逾多不乱；至于忘怀得意，傍若无人。”（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）渊明“存心处世，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”（逮钦立语）。日后，他的个性、修养，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。外祖父家里藏书多，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，在学者以《庄》《老》为宗而黜《六经》的两晋时代，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习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而且还学了儒家的《六经》和文、史以及神话之类的“异书”。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，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，培养了“猛志逸四海”和“性本爱丘山”的两种不同的志趣。

陶渊明大半生遭逢晋宋更替的乱世。晋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、大动乱、大混战、大篡弑的时代。据历史记载，陶渊明一生遭逢六次废、杀、立皇帝，其中每一次废立，无不伴随着一次政治上的大清洗和大屠杀。何晏、邓飏、夏侯云、李丰、嵇康等名士不满时政，因而被杀；同一时期的作家殷仲文，因忤刘裕，加罪被诛。在《感士不遇赋》中说“真风告逝，大伪斯兴，闾阎懈廉退之节，市朝驱易进之心。怀正志道之士，（下转第 150 页）

经》“雅颂”里，大量祈求福禄寿康、年岁丰好、子孙绵远的诗篇，表明先人们不仅祈求个人幸福，而且也祈求后代幸福，“永存”思想一步步加强。这些思想除了影响孔子晚年的“永存”思想外，对研究中国思想史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《诗经》“雅颂”里这些祈求福禄寿康、年岁丰好、子孙绵远的诗篇，祈求的场面宏大隆重，态度毕恭毕敬，祈求的对象也多是赫赫扬扬的圣贤。然而，王朝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，子孙还是不可避免地“微矣”，这是孔子所亲见。先贤们制礼作乐，制纲作纪，制鼎作铭，为求“永存”，然而却是礼坏乐崩、王纲解纽，致使有人“问鼎”。所有的这些都促使先贤们探索一条“永存”之路。孔子言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此语一出，表明孔子已有“永存”思想。

孔子“永存”思想的形成，对保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绵延不绝提供了理论基础。这个理论在当时也许并不完善，但毕竟开启了对“永存”道路的探索。“天下太平永存”也成为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。“永存”的理论一经确立，就为中国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。有了这个方向，人们就不会站在一时一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而是站在“千秋万代、万寿无疆”的角度去深思熟虑。这也解释为什么当初孔子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态度如此坚决。譬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：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。”因为这些都是为“永存”做文化准备！更为可贵的是，孔子已经突破了狭隘的中国观念，而为“天下”寻找一条通往“永存”的道路。因此，最理解孔子

思想的颜渊才说：“夫子之道甚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”

人有追求福禄寿康、年岁丰好、子孙绵远等幸福生活的权利。实际上，人类的辛勤努力也就是为了获得幸福生活并“永存”。追求“天下太平永存”，既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，也是世界上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选择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，孔子既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。

最后，我们还是念念不忘孔子的“弦歌”。那必然是与天地之声相和的，庄严而又华妙的，尽善而又尽美的乐章，可惜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了。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又一个巨大的遗憾！要是孔子还在世，多好！他一弹琴，我们就又能听到：泰山岩岩，江汉汤汤。桃花夭夭，蒹葭苍苍。于万斯年，子孙永保。千秋万代，万寿无疆！

-
- ① 袁行霈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3—61页。
 ② 钱穆：《孔子与论语》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65页。
 ③ 袁行霈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2页。

作者：孙俊红，平顶山市委党校科文教研室主任、副教授，
研究方向：先秦文学。

编辑：康慧 E-mail：kanghuixx@sina.com

(上接第133页)或潜至于当年；洁己清操之人，或没世以徒勤”。而少有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”(《杂诗》其五)抱负的陶渊明，在先后“五仕五归”的十三年里，他为实现“大济苍生”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，但终因政局的混乱跌宕、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使诗人对此黑暗政治产生了深深的绝望，而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一)，“质性自然，非矫励所得”(《归去来兮辞序》)的天性，也终于使诗人毅然辞官归里，过着“躬耕自资”的生活。

“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”的秉性气质使陶渊明不能不愤、不能不说；而如同“宏罗”“密网”的社会又使他不能明说，不能直白！于是，特别的秉性气质面对特定的社会环境，自然只能以独特的方式开始新的生活——辞官归田！也自然只能在其诗中以隐晦、曲折的独特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。正如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指出：“陶潜之在晋末，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

候……但《陶集》里有《述酒》一篇，是说当时政治的。这样看来，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，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、阮籍自然得多，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”。朱熹说：“渊明诗，人皆说平淡，某看他自豪放，但豪放得来不觉耳。”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游国恩，王起，萧涤非等主编.中国文学史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3.
 [2] 吴小如.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[M].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92.

作者：卢惠平，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中文讲师，
研究方向：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
编辑：康慧 E-mail：kanghuixx@sina.com
